# 第一章 谁是知识分子

早期基督教经院哲学最杰出的教父奥古斯丁（Auielius Augustinus，公元 354～430 年）在论及“时间”这个概念时说过：“没有人问我，我还明白。如果有人问我，我想说明白，却是茫然不解了。”[1]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分子”也是这样一个习焉不察，而一旦细究起来，却难以说清的概念。

知识分子是一个历史的文化的范畴，它是在人类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和一定的文化条件下产生的。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界说颇为不同。在我国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知识分子又是现实政策和实际工作的对象，除了一般理论上的界说外，还有特定的操作性界定。

理清“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可以从三个不同层面入手：第一，“知识分子”这个词指称的对象是什么？第二，典型的知识分子具有哪些基本特征？第三，在现实生活中，知识分子实际上包括哪些人？

一、“知识分子”这个词指称的对象是什么

不少中国学者认为“知识分子”这个词是西文的译语。台湾大学社会学系的叶启政教授对此有比较详尽的讨论。

叶启政教授认为，“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来自西方。欧洲有关“知识分子”的概念有两个，就现行较常用的英文来说，一个是 intelligentsia，另一个是 intellectual。这两个词分属东欧和西欧，含有不同的历史意义。

[1] 叶秀山，傅乐安．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 2 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318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Intelligentsia 来自俄国，1860 年由作家波波里金（Boborykin）提出，随即流行起来。当时这个词专指 19世纪 30 到 40 年代把德国哲学引进俄国的一小圈人物。当时的沙皇俄国相当落后，留学生带回西欧社会思想及生活方式，不满当时俄国的状况，或者满怀乌托邦的理想高谈阔论并模仿西欧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或者着手实际的社会改革，他们当中后来产生出不同的思想群体，如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新康德主义等。另有学者认为，intelligentsia 这个词源于波兰，1844 年由李贝尔特（Karol Libelt）使用。当时的波兰有一个文化上同质性很高的社会阶层，他们的心理特征、生活方式、社会地位、价值体系都独具特色。这个阶层是拥有土地的城市贵族，与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有别，为了维持其具有特色的生活方式，设立了一套自己的教育体系。在此体系中，学生学习各方面的知识，突出培养强烈的领导意识与社会责任。由此环境培养出来的人非常重视自己的学历并以此为荣。后来这种贵族式的精神为波兰受高等教育的人所继承，他们勇于批判社会，以国家大事为己任。当波兰被列强分割时，这批人成为救国和反抗统治者的主要力量。因此，从 intelligentsia 这个词的历史含义来看，知识分子是一群受过相当教育、对现状持批判态度和反抗精神的人，他们在社会中形成一个独特的阶层。这个阶层及其传统特性在十月革命后已经逐步瓦解消失。苏联以及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先后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把知识分子定义为从事脑力劳动的专业人才，不再指具有强烈社会意识及批判态度的特殊阶层。

西欧“知识分子”一词的来源与东欧不同。Intellectual 来自法国，起源于 1898 年的德雷弗斯（Dreyfus）案件。（注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的著名政治事件。1894 年法国陆军上尉德雷弗斯被指控于 1894 年 12 月向德国人出卖军事秘密，被定为叛国罪并于同年 12 月 22 日被判处在魔岛终身监禁。起初公众支持定罪，排犹集团趁机宣扬，认为德雷弗斯象征着法籍犹太人对国家的不忠。1896 年后支持德雷弗斯的人逐渐增加，以左拉为代表的人士掀起一场要求释放

他的群众运动，全国分成对立的两派，斗争极为激烈，并同反犹太主义、反教权主义和反共和主义等活动联系在一起。1898 年 8 月发现有关德雷弗斯的文件系伪造，1899 年雷恩军事法庭重审，仍认定德雷弗斯有罪，但法国总统为消除争端，对德雷弗斯实行赦免。1906 年最高法院撤消了雷恩军事法庭的判决，并为德雷弗斯恢复了名誉。)左拉在 1898 年 1 月 13 日以《我控诉！》为题给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重审德雷弗斯被诬案。第二天，这封公开信在《曙光》报上刊出，主编克雷孟梭用“知识分子宣言”（Manifeste des Intellectuels）几个字来形容它。此后，只要一提 intellectuels，人们就理解为主张或同情为德雷弗斯平反的作家、教授、新闻记者们。他们对时政多所指陈訾议，是政治上激进色彩很浓的人。此后，法文中的 intellectuels 专指一群在科学或学术上杰出的作家、教授及艺术家，他们批判政治，成为当时社会意识的中心。这种传统渊源于法国大革命后一批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反抗当时社会既有的标准及措施，谈论、鼓吹实证哲学，具有相当浓厚的革命气息。他们大都不在学术界，而是长年逗留在咖啡馆中高谈阔论，带有波西米亚圣徒式（Messianic Bohemians）的精神，以天下为己任。就此传统来看，intellectual 没有社会阶层的含义，而注重个人心态及其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1] 由于这两个词的历史含义有所不同，因而在现代英语中通常用 intellectual 泛指‘知识分子’，而 intelligentsia 则专指‘知识阶层’。

在中国古代，与近代西方‘知识分子’涵义相近的概念是‘士’或“士大夫”。“士”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中心位置，位居士、农、工、商‘四民之首’。荀子有‘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说法，道出了‘士’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功能。中国历史上，自秦汉以降，在比较安定的时期，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维持都落在‘士’的身上；在比较混乱的时期，“士”也往往负起政治批评或社会批评的任务。通过汉代的乡举里选和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士”可以通过考

[1] 叶启政，谁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台湾发展（台）中国论坛杂志，1989

试进入官僚集团，即所谓“学而优则仕”，整个官僚系统大体上是由“士”来操纵的。通过宗族、学校、乡约、会馆等社会组织，“士”成为民间社会的领导阶层。因此，在一般民众心目中，“士”是“读书明理”的人；他们所受的道德和知识训练（以儒家经典为主）使他们成为惟一有资格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人选。❶

余英时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来自一个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源头。从孔子开始，知识分子就以“道”自任，而这个“道”是中国所特有的。先秦三大学派——儒、墨、道——尽管各道其所道，但他们在代表“道”说话这一点上却并无不同。西方近代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脱离中古宗教的“俗世”（Secular）人物。他们尽管多少都有宗教背景，但是他们批评社会则并不必然根据宗教信仰或神学理论。相反地，他们的凭藉往往只是个人的“理性”或“知识良心”。另一方面，西方中古的“道”寄托在基督教。这是上帝所启示的“道”，其代理人是教会僧侣与神学家——和世俗政治权威并立的精神权威。因此，近代西方知识分子不肯自承源于这个宗教传统，因为他们已不复遵守“凯撒之事归之凯撒，上帝之事归之上帝”的原则，他们要管的正是凯撒的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直接承三代的传统而起。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礼乐已不再出自天子，而出自诸侯，故孔子斥之为“天下无道”。统治阶级既然不能承担“道”，“道”的担子便落到了真正了解“礼意”的“士”的肩上。在这个意义上，孔子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知识分子。孔子以前的“士”只是古代贵族社会中的一个固定阶层，孔子以后，士的处境开始变化。孔子首先对“士”重新加以界说。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又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同上“宪问”）这种新的“士”就是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的原型。上古的“道”具有宗教性（“天道”）的成分，这个传统到了孔子手中却并没有走上“天道”的方向而转入了“人道”的领域。孔子以后，百家竞起，虽所持之“道”不

❶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论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164 页

同，但大都以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为最后归宿。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受到他们所承继的文化传统的规定：就其要管凯撒的事这一点来说，接近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但是就其代表‘道’而言，则又接近西方中古的僧侣和神学家。❶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鸦片战争后，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伴随着废科举、兴新学而出现的，是在中国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过程中，从封建士大夫中脱胎而来的。他们或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或从事近代学术研究，或创办近代企业，或致力于现代化建设。严复、梁启超、张謇、詹天佑等人可以算作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

今天我们在使用“知识分子”这个词时，它的涵义早已远远超出中国古代的‘士’，与西方的用法也不完全相同，通常是指受过一定程度的专门教育、具有专业知识、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并具有相应职称的脑力劳动者。

二、典型的知识分子具有哪些基本特征

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知识分子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恩格斯指出：“当人的劳动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需的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微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❷这就是说，知识分子是社会分工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的产物。由此而论，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就是‘脑力劳动者’。

当代社会学大师帕森斯（T. Parsons）从结构功能主义出发，揭示了知识分子产生的文化根源。按帕森斯的看法，知识分子的产生

❶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77；5～7 页

❷ 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21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有赖于两个条件：一是文字的出现，一是“哲学的突破”。所谓哲学的突破是指人对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宇宙世界有了一个概念化的掌握，即意识到人之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人不只是一个生物性的存在，他除了生物性的需求之外，还有心理性的需求，即对于生命意义的追求，对终极价值的追求，同宇宙世界接触的追求。一言以蔽之，他有一种了解“为什么”的需求。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出现了文化事务专家即某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最主要功能就是思索并解答这些问题。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起源几乎都是教士、先知、哲学家的原因。因此，知识分子的功能主要是文化性的，他们所从事的是有关价值、观念、符号等文化性的活动，为社会建立一个文化性的意义系统。在社会发展的早期，文字是极少数人能够掌握的象征符号，因此具有“神圣的”性质。在一个文字被社会大众崇拜的社会里，知识分子才能成为一个阶层，一个身份集团。从这个角度看，知识分子应当是“文化事务专家”，而不仅仅是一般的“脑力劳动者”，或者说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中关心并从事创造、阐发、传播文化价值的那一部分人。

知识分子的功能既然在于解释外在世界，自然总是倾向怀疑与批判，他的想法和看法与社会现状总有距离。没有一个现实社会是圆满的，因此知识分子总是对社会现状不满足，总是批判他身处的社会，总是企图按照理性和自己的理想改造或改良社会。这也许是古今中外最典型的知识分子的形象。由于这个形象，他们被浪漫地认同为社会的眼睛与良心。[1] 马克思和恩格斯可算是典型代表，他们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以至最终灭亡的客观规律，号召无产阶级充当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敲响旧制度的丧钟。马克思和恩格斯现在已被尊奉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但是他们并不来自无产阶级，他们的真正社会成分正是知识分子。就

[1] 金耀基：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角色，见：汤学智，杨匡汉编：台港暨海外学界论中国知识分子，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此而言，知识分子又是社会的自我批判力量及大众的代言人。

由于知识分子总是批判他身处的社会，因此，他与政治权威总是具有先天性的紧张关系。一方面，知识分子要与政治权威保持距离，以保持他特殊的批判者的身份；另一方面，政治权威也不喜欢知识分子，害怕自己的权威受到怀疑和批判就这点说，知识分子又具有同政治权威疏离的倾向

因为知识分子仅仅掌握知识而不占有生产资料，所以在社会生产关系体系中并不占有独立的地位，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在某些社会的特定历史时期，甚至也不同任何一个社会阶级或阶层充分整合。毛泽东曾把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比作“毛”，认为他们附在帝国主义者、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五张‘皮”上,民主革命革掉了前三张‘皮”,社会主义革命革掉了后两张‘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能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否则就在天上飞,就会成为‘梁上君子”[1]。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曼海姆(Karl Mannheim)则认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自由飘游、无所依附(free-floating) 注：这是曼海姆关于知识分子性格的一个重要看法，来源于他早年的经验。曼海姆青年时期曾活跃于布达佩斯知识分子的圈子。这个圈子类似 19 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尚未固定地隶属于某一个阶层或阶级，在社会中处于孤立的边际地位。当时匈牙利各种主要的社会力量都陷于停顿状态，犹如一潭死水，只有聚集于布达佩斯的一小群激进的知识分子自命为这个国家惟一的声音，而且是国家的良心，是社会整体利益的守护者，因为他们是惟一没有与这个停滞的社会充分整合的阶层。曼海姆的政治观及社会观后来虽有巨大的转变,但对于‘自由漂游、无所依附的知识分子’的救赎性格，他的信心却从未动摇。他曾写道，知识分子“在漫漫长夜可以扮演守夜者的角色”。他后来将早期的看法引申到所有西方文明，

[1] 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见毛泽东选集(第 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487、490 页

认定当整个西方文明面临混乱、崩溃、停滞的时刻，只有知识分子能超越党是党非，成为捍卫理性及道德的精英分子。黄瑞祺．意识形态的探索者——曼海姆．台湾：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35～58页）。从这里看，知识分子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和阶层，也不与其他社会阶级或阶层充分整合，而是一个社会中相对自由飘游的集团。

大体说来，在现代西方语境中，知识分子有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知识，懂得使用象征符号来解释宇宙人生；第二，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形成一个与社会中其他阶级不充分整合的、不依附于现存体制的"自由飘游"的、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第三，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对时政采取批判态度，对现状往往不满。对于第三个特征，以色列的康菲诺（Michael Confino）综合各家的意见，归结为以下的五点：①对于公共利益的一切问题——包括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的问题——都抱有深切的关怀；②这个阶层常自觉有一种罪恶感，因此认为国家之事以及上述各种问题的解决，都是他们的个人责任；③倾向于把一切政治、社会问题看作道德问题；④无论在思想上或生活上，这个阶层的人都觉得他们有义务对一切问题找出最后的逻辑的解答；⑤他们深信社会现状不合理，应当加以改变。❶

康菲诺归纳出来的五点，大体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相符，特别在责任感和关心世事方面。从曾参的"仁以为己任"到范仲淹的"以天下为己任"，都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对道德、政治、社会各方面的问题具有深刻的责任感。谈到关心世事，更有明末东林党顾宪成的一副对联的下句为证："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关心"的传统精神仍然跃动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之中。邓拓在《燕山夜话》中便写过一篇"事事关心"的杂文。他在"歌唱太湖"一首诗中更写道："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地间。莫谓书生

❶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77；120～121页

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延绵不绝的明证。

代表“社会的良心”的知识分子无论在西方社会还是中国社会都是存在的。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这个传统在西方是一个现代的现象。一般地说，其形成不早于 17、18 世纪。西欧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philosopher）大概可代表西方知识分子的原型；俄国的 intellegentsia 的渊源也只能上溯到 18 世纪。与西方相对照，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可算是源远流长。我们的知识分子传统至少要从春秋战国时代算起,足足有 2000 多年的历史，而且几乎没有中断过。

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存在一群为数不多、基本上是处理文字的人，即通常所说的‘读书人’或‘士’,他们在儒学的熏陶下具有一套传统。根据钱穆的意见,早期的‘士’由习礼而至批评当时贵族的一切非礼，孔子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孔子的批评，一方面是历史的观念，根据文王周公,从礼之本源出发;另一方面是人道的观念,根据天命、性、仁、孝和忠恕等观点，从礼的意义出发。诸子百家可以说是第一次最明显地表现出“士”在思想上对社会对贵族的不满。科举制度建立以后，中国的“士”在制度化的晋升渠道引诱与君权至上的政治体制的高压下,显得十分软弱无力。在这种情况下,‘士’的特性在于以人文精神为指导来完成个人式的道德成就，而不以成就知识为主题。“士”的成就在于以内发式的个人道德成就为基础，讲求个人修养以成就普遍的道德伦理规范，进而推演到政治设施。因此，中国古代的“士”在精神追求上始终忘不了政治，即使是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著书讲学也对政治抱有很大的兴趣。

大致上讲，中国古代的“士”与西方近代知识分子有两点基本差异 第一,中国的‘士’不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追求知识,而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注重伦理道德，追求以内化的道德力量来约束自己、塑造自己的人格,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王者师”,以儒学教化天下。第二,西方近代知识分子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他们以所谓的“市民社会”或类似的环境为其生存环境，可以依靠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在民间立足，从

事自由职业，独立谋生，在这种环境中相对自由漂游，与现存占支配地位的体制及统治阶级没有多少内在的必然联系；中国古代的“士”则制度性地依附于、服务于现存体制，他们既是现存体制的产物又造就并维护了现存体制，并且只有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或者后备军才有存在的价值“学而优则仕”正是这种依附性的典型表征。[1]

三、在现实生活中知识分子实际上指的是哪些人

根据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典型的知识分子包含哲学家、科学家、作家、艺术家、音乐家等等。在这里，知识分子并不是通常所理解的脑力劳动者，而是指脑力劳动者中关心人类文化价值、具有社会责任意识的那部分人，大体上相当于“思想家”。如果一个杰出的科学家竭其一生，不辞辛劳地发明了原子弹，为人类文化添加了重要的内容，但是他却没有在发明过程中，探究原子弹可能带来的后果，那么，这样的科学家是创造者，但不属于典型的知识分子。由于社会分工，人们的社会功能日益细化，使得人与社会的关系趋向以单纯的职业关系为核心，科技的发展带来了职业的专业化。很多学有专长的专家，他们可以为社会大众带来更便利的生活方式、更丰盛的物质生活，但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可能是浅薄的，对生命的了解可能是单纯的；他们关心的是如何把自己的才干发挥在专业上，往往忽视了他们所创造出来的文化内容。[2] 因此，一个科学家或学者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除非他关注事关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大问题（如战争、贫穷、可持续发展等）；一个小说家或电影导演也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除非他写作、导演的东西不纯为感官娱乐而或明或暗地触及到较为广

[1] 陈国祥从文化观点谈知识分子——访叶启政教授，见汤学智，杨匡汉编，台港暨海外学界论中国知识分子，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黄平，当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非知识分子化，二十一世纪，1995，4

[2] 金耀基，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角色，见汤学智，杨匡汉编，台港暨海外学界论中国知识分子，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泛深刻的社会问题。[1] 与此相关，知识分子有一个被认为是基本界说的特殊涵义：即知识分子是一个关心他个人身处的社会及时代的批判者与代言人。这是西方理想化的知识分子形象。由于这个形象，他们被浪漫地看成是社会和时代的眼睛与良心。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理想型的知识分子毕竟只是极少数，通常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指这种理想化的知识分子形象。在现代汉语中，通常把知识分子解释为“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等”(注: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1734 页。与此类似的解释还有《现代汉语词典》“: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1467)。《社会学百科辞典》“: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以依靠脑力劳动获取报酬为其主要生活来源的社会阶层。如科学技术工作者、医生、教师、记者、文艺工作者等”(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台湾出版的《中文大辞典》指出“:知识分子”有两种涵义,其一是指社会上曾受教育而从事脑力工作之人,如教师,律师,记者,医生,会计师,工程师,科学家,艺术家等,1953 年,美国在香港援助知识分子,则仅限于大学毕业程度者;其二是称指导社会运动之非劳动者出身之人物。而除了“知识分子”之外,还有一个“知识阶级”的概念。“知识阶级(Intelligentsia)有广狭二义,广义指一般受教育者,狭义指受有高等教育,以知识为生活手段之人,即劳心之劳动阶级,如教员、律师、医生等属之,为中间阶级或浮动阶级之一种,因其不能自存,须依资产阶级及劳动阶级为生,故为非基本阶级,亦为非支配阶级。”(台湾中文大词典编纂委员会中文大辞典(第 23 册).台湾:台湾中国文化学院和中国文化研究所,1982:273 页)。照罗森塔尔和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知识分子”条目,知识分子是“由脑力劳动者所构成的社会阶层。”工程师、技师及其他技术人员的代表、医生、律师、艺

[1] 赵衡毅.走向边缘.读书.1994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术工作者、教师、科学工作者和大部分职员都属于这一社会阶层。”在具体操作中，我国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把具有中专以上学历并从事脑力劳动的人都当作知识分子。随着社会生活对知识需要程度的提高和高等教育的普及，目前我国有关部门已经把作为知识分子必要前提的学历条件提高到大专程度。在有关知识分子的实际工作中，各部门使用的概念不一样，对概念的界定也往往根据自己的工作范围确定，例如统战部就把自己知识分子工作的对象界定为有代表性、有影响的党外知识分子。

有一点需要明确，并非凡是受过一定教育、具有专业知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例如，在我国，国家公务员就不属于知识分子的范畴。国家公务员即通常所说的党政干部（严格地说，政府部门的干部才是公务员，但我国目前党的系统的干部也参照公务员来管理，因此，我按照习惯，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把他们归为一类）。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干部知识化、专业化，这支队伍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现在已经具有大专以上的学历，其中硕士、博士也不在少数。如果仅从他们的教育背景和掌握的专业知识水平来看，无疑同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差别，而且许多人原来就是知识分子。但是，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有一个重要特征，即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就是说，知识分子的工作是以创造、阐发、传播或者运用知识为核心内容的。国家公务员虽然在工作中也要运用各种专业知识，但他们主要从事社会管理工作，同知识分子在工作的内容和性质上有根本的区别。另一方面，我国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作为政策对象而被界定的特殊社会阶层（这一点将在后面论及）。就此而论，国家公务员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他们本身自然不能成为政策的对象。目前，我国在干部组织人事管理中，已经将公务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分类管理。因此，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凡是党政机关纳入公务员序列或参照公务员来管理的干部，无论其具有多高的学历，也无论其在工作中涉及多少专业知识，都不在本书所讨论的知识分子范围之内。有鉴于此，本书所讨论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指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从事专业

技术工作并具有相应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

在我国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知识分子主要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自由择业’的知识分子，即通常所说的‘下海’的科技人员、教师和文化人，他们是已经进入市场的知识分子；另一部分是仍在各类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中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是没有进入市场或基本无法进入市场的知识分子。这种界定并非理论上的推演，而是同实际的知识分子政策及工作范围有关。例如，2000年末召开的第十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把“自由择业的党外知识分子”纳入统一战线知识分子工作的范围，并且明确了这个群体主要包括执业律师、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等各类社会中介机构中的专业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中的科技和经营管理人员，自由撰稿人、自由文化人、独立策划人、各类经纪人、个体医生等自雇知识分子。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则始终是知识分子政策和工作的对象。

四、党内知识分子和党外知识分子

在我国独特的政治语境中，知识分子还有党内知识分子和党外知识分子之分。把知识分子区分为党内知识分子和党外知识分子，是统一战线开展知识分子工作的特殊需要。新时期统一战线汇集了并在工作中联系着为数众多的党外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2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统一战线始终把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重点做好有代表性、有影响的党外知识分子的工作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充分调动广大党外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鼓励和支持他们投身现代化建设，为他们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创造良好的条件。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充实、完善和贯彻落实，始终同统一战线密切相关。

大致看来，党外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似乎是不证自明的，就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除中共党员之外的那个社会群体。但是，任何未加分析的概念都不足以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为了避免讨论的含混，我们必须先来分析党外知识分子这个概念。

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党外知识分子有两种不同的语义：第一种是广义上的党外知识分子，即除中共党员之外的非中共知识分子。其中既包括作为 8 个民主党派成员的知识分子，也包括未加入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通常所说“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性工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党外知识分子’的概念。第二种是狭义的党外知识分子，这是指那些既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加入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这样一种区分并不是出于学理上的需要，而是出于实际工作的需要。在统战工作中，民主党派工作是一项特殊重要的工作，有专门部门负责联系。而对于其他不属于民主党派的非中共知识分子，则另设部门负责联系。为了避免交叉，于是出现了上述区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统一战线工作主要是做那些在社会上有代表性、有影响的人物的工作，因此，统一战线中的“党外知识分子”实际上是一个专用的政治性、政策性术语，它所涵盖的并不是全体党外知识分子，而是党外知识分子中有代表性、有影响的人士。

由于本书只是从理论上探讨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和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因此，当我把统一战线中的党外知识分子纳入讨论、分析的视野时，没有局限于统一战线实际工作界域的区分。不过，指出上述概念使用上的内在差异仍然是有意义的。在下面的讨论中，“党外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是在广义上使用的。与此相对应，为了分析的方便,我把中共党内的知识分子称为‘党内知识分子’。

目前在我国究竟有多少知识分子，其中党内知识分子和党外知识分子各有多少，这都涉及统计口径。根据人事部《1996—2010 年中国人才资源开发规划纲要》的数据，中国当时(1996 年)中专学历以上和初级职称以上的人员为 4465 万人，2000 年将达到 6670 万人,其中大学以上学历占 40%。[1] 另据中央统战部的说法,目前我国

[1] 王申贺.转型期中国社会结构.人民中国出版社（电子版）. http://www chinaavenue.com/wash/htmbook/zua.htm

知识分子的总数将近 5 000 万人，其中党外知识分子占总数的一半以上。[1]不管这个具体数字是多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党外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总体中占多数，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群体。

党内知识分子和党外知识分子是有区别的。大致说来，这种区别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共党员中的知识分子，原则上与其他成分的党员一样，既没有特殊的利益，也不具备特殊的代表性。作为中共党员，其根本属性应当是党性，其所代表的应当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外知识分子则不同，他们本身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具有特殊的利益和代表性。虽然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在官方语言中，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在实际上，从来没有人把他们与普通工人、农民混为一谈。关于这一点，仅仅从至今仍然保留并实施的知识分子政策，即可见一斑。作为知识分子政策的对象，党内知识分子和党外知识分子是一样的。但是，作为统一战线工作的对象，则只有党外知识分子了。权威的统一战线教程在论及为什么要把党外知识分子作为统战工作对象时这样说："党外知识分子，尤其是中高级党外知识分子，其中许多人是政治性代表人物,在社会上有广泛的联系和影响，把他们作为统战对象，给予特殊的关注，如政治上的安排、工作上的使用以及生活上的照顾，是十分必要的。"[2]既然在政策上规定了要对他们从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给予特殊的关注和照顾，自然就意味着承认甚至造成了他们的特殊利益。而之所以要这样做，是由于他们在政治上有代表性，在社会上有广泛的联系和影响。第二，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内知识分子自然成为执政党的成员。就此而论，党内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更为密切。党外知识分子在这一点上与党内知识分子也

[1] 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编．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学习问答．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90 页

[2] 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政策理论研究室，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编著．中国统一战线教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225 页

有明显的不同。尽管在我国现行的政党制度中，8个民主党派是参政党，民主党派成员中部分具有影响性、代表性且又符合中共使用干部标准的人士被安排担任各级人大、政府和检察、司法等机关的领导职务，但是，从总体上看，由于在我国政党制度中，共产党是领导核心，民主党派在政治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所以，民主党派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是不能同中国共产党相提并论的。就这一点而言，即使是作为民主党派成员的党外知识分子，其同政治权力的关系，也比党内知识分子要疏远一些。第三，党内知识分子受到党性和党纪的约束，在思想、言论上，不可能超越党的利益之外，用标准的政治术语说，就是必须“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党外知识分子虽然也要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中那些加入了民主党派的也要受到各自党派纪律的约束，但是，毕竟在思想、言论上，要比中共党内的知识分子宽松一些，也就是说，党外知识分子比党内知识分子有更多的思想、言论自由。

上述三个方面的区别，也可以看作是党外知识分子不同于党内知识分子的三个基本特征。由于存在这些基本特征，党外知识分子有可能起到不同于党内知识分子的特殊的社会作用。

# 第二章　为什么知识分子在中国会成为一个特殊的问题

1984 年，邓小平在会见前来参加建国三十五周年庆祝典礼的华人科学家时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我们至今还没有解决好。解决这个问题非常迫切和重要。”[1] 这段讲话还有另一个版本，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记载，邓小平的这段话是：“我在昨天讲话中特别讲了知识分子问题，在一些老干部思想中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所以要专门讲。这个问题很迫切。”[2] 两个版本虽然在文字表述上有出入，但基本意思是一致的。那么，为什么知识分子在中国会成为一个特殊的问题？这个特殊问题是如何形成的？

一、知识分子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作为政策的对象而被界定的特殊群体。知识分子在中国成为一个问题，成为政策的对象，是由中国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在西方和中国古代社会，知识分子并不构成问题，也不存在“知识分子政策”。在西方，知识分子通常在社会经济、政治结构中相对独立，一方面以专业知识为谋生的手段，另一方面以社会的眼睛和良心自居，在社会上有自己的

[1]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论统一战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266 页。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292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